

苏小东 编著

中华民国 海军史事日志 (1912.1—1949.9)

九洲图书出版社

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九四九年九月)

苏小东 编著

九洲图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1912~1949/苏小东编著 . - 北京:
九洲图书出版社, 1999.9

ISBN 7-80114-466-X

I. 中… II. 苏… III. 海军-军事史-中国-民国
IV. E2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648 号

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1912 年 1 月—1949 年 9 月)

出版:九洲图书出版社(北京市车公庄大街 6 号)

邮编:100044 电话:68366742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九洲财鑫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630 千字

印张:25.5

版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14-466-X/K·37

定价:38.80 元

自序

当这部《中华民国海军史事古志》终于脱稿时，我心中丝毫没有轻松和踏实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是否会有入对它感兴趣，更担心当真的有人感兴趣一读时又会令读者失望。

说来惭愧，我自涉足中国海军史研究，迄今已有 17 个年头，所获成果却微不足道。回想起来，当初执着地跨入这一领域，其实并没有想要做深入的研究，而主要是为了应付教学工作的需要。1982 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师海军学院工作，并且成为讲授历史课的教员，于是“历史”和“海军”便在我的头脑中很自然地联系起来。因为当时国内的海军院校中都没有开设中国海军史课，自以为是学历史的，且已是海军中人，于是又进而不知天高地厚地充当起开拓者的角色，并满怀激情地想尽快填补海军史教学的空白。按照一般循序渐进的治史步骤，本应是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先作大事记和资料长编，并从专题或个案研究入手，然后方可扩及通史。但我急于要开出这门新课，遂决定走捷径一步到位，取巧的办法当然是充分利用和吸收现有的研究成果。然而，当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晚清的北洋海军、中法马江之战、中日甲午海战三个专题内，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海军史体系。此外，所能见到的还有台湾出版的包遵彭所著《中国海军史》(台北，1974 年)和台湾师范大学王家俭教授的《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北，1984 年)，以及美国学者 John L. Ro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 – 1895”(坎布里奇，1967 年)。尽管已有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且不宜直接用于

教学,但他们所提供的线索和材料却使我获益匪浅。正是踏着先行者的脚印,我开始步入中国海军的历史长廊,并在贯通的过程中寻找新的史料去补苴缺失的环节,终于梳理出中国海军的发展脉络。3年后,我编写出一部内部使用的教材,并率先在海军院校中开出了中国海军史这门选修课。又4年后,我主编出版了《中国近代海军史》一书,我所讲授的海军史课也由选修改为必修。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几乎用了整整7年时间,当初的激情也早已冰释于汗水中。

我既已走出了第一步,就只能继续走下去,即使是为了应付教学,做些深入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当我国过头来再作专题研究时,却忽然发现,自己手中为数不多的历史残片,即使是主观地加以粘合,也大多难以复原出清晰的历史画面。我这才意识到,以前匆匆走过的路,就教学而言或许是捷径,但就研究来说却是弯路。于是我不得不从头开始,反复细致地爬梳海军史料,老老实实地作大事记和资料长编。随着史料积累的日益丰富,当我将一件件史实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列起来时,我面前的历史画面终于变得鲜活起来,甚至连种种细节也已波澜纸上。我由此体会到,这项基础工程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学的表现形式:对于研究人员来说,以此为工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自当事半而功倍;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走近历史现场,可以直接触摸到中国海军历史脉搏的跳动,亦会别有一番感受。因此,当我的朋友姜鸣编著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出版后,我决定踵其后将累积多年的中国海军大事记和史料长编中的民国部分整理出来,并继续挖掘史料进行补充和考订,最终形成了这本《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

由于本书是在我前期所编1912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海军史料长编和大事记的基础上完成的,时间跨度较长,期间曾经给过我帮助的师友颇多,故无法在此一一致谢,但我对它们将永远心存一份感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的王家俭教授本已定

居加拿大，当他听说我在寻找原东北海军将领沈鸿烈在台湾撰写《东北边防与航权》未刊稿时，当即热心为我多方搜求，并很快利用来祖国参加学术会议之便将该稿复印件送到我的手上，使我深受感动，因为其中的分量已远远超出了一份资料。此外，本书还吸收了已发表刊出的大量研究成果，在此也一并向诸位作者致以谢意。为促成本书出版，我所在学院的首长李秉桥少将、徐一天大校、秦兰悦大校等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帮助，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虽可视为姜鸣所著《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的续篇，惟实际水准与其相去甚远，为此深感愧疚，还请读者见谅。其实我本一直试图“取法乎上”，结果却很难如愿。由于涉及到出版成本，字数受到限制，很多历史照片和已制成的图表都无法收入，只能忍痛割爱。在史料方面，虽说任何个人的搜求事实上都难以穷尽，缺漏在所难免，但所见所知有限者如我，真不知会遗漏多少本应收录的事件。另一方面，即使是对已搜集到的史料的使用，在内容的取舍和记事的详略上也肯定多有不妥之处。好在本书所记仅为史实细节，且都有史料为依据，还不至于对读者产生严重的误导。而我对这本书的作用又并无太高的奢望，只要能为哪怕几位同仁提供一点进一步研究民国海军的线索，使他们节省一些宝贵的时间，于我也已是莫大的安慰了。

正因为我对我的这本书没有多大把握，所以也就不好意思请专家学者作序，虽然我很想。如同小商贩一样，没有雄厚的资本做广告，便只好诚惶诚恐地自己吆喝几声，是为自序。

苏 小 东
1999年春于烟台东山

自序	(1)
引言	(1)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9)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	(34)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	(78)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	(91)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	(98)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	(110)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	(131)
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	(148)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	(165)
1921年(中华民国十年)	(186)
1922年(中华民国十一年)	(198)
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	(225)
1924年(中华民国十三年)	(261)
192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	(293)
1926年(中华民国十五年)	(311)
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	(332)

1928 年(中华民国十七年)	(359)
1929 年(中华民国十八年)	(378)
1930 年(中华民国十九年)	(417)
1931 年(中华民国二十年)	(446)
1932 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	(475)
1933 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	(510)
1934 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534)
1935 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555)
1936 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566)
1937 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578)
1938 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616)
1939 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	(636)
1940 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	(655)
1941 年(中华民国三十年)	(678)
1942 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	(704)
1943 年(中华民国三十二年)	(714)
1944 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	(722)
1945 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730)
1946 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745)
1947 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	(757)
1948 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	(773)
1949 年 1 至 9 月(中华民国三十八年)	(786)
结语	(797)
主要参考书目	(799)

引　　言

民国海军是在继承晚清海军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晚清海军却不是由中国古代水师发展而来，而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其历史也仅有半个世纪左右。

中国有长达 18000 多公里的海岸线，是一个沿海大国，且在古代也曾是一个海上强国。但自明代以后，中国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厉行禁海政策，致使海上力量日趋衰微，最终只能充当“水上警察”的角色了。而几乎就在中国水师走向衰败的同时，西欧国家以地理大发现为先导，开始纷纷向海外扩张，并以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刚刚开辟的殖民地以及在殖民地的贸易。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工业革命的发生，海军变革的步伐也日益加快，特别是进入 19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各国的海军先后实现了近代化（亦称现代化）。其主要标志是：舰炮由发射实心弹的滑膛炮发展为发射爆破弹的线膛炮，军舰的动力由风帆过渡到蒸汽机，木质军舰被铁甲舰或钢壳军舰所代替。在海军变革的过程中，甚至在此之前，西方殖民者凭借其海上优势，即开始对中国这个东方的古老而又已衰落的封建大帝国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840 年，清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通过鸦片战争，首先从海上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尽管英军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战船仍以帆船为主，但其战船之坚大，火炮之猛烈，着实让中国人领教了“坚船利炮”的威力。当时的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在思考应对策略时，还无法认识到英军的坚船利炮与清朝水师船炮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但他们深知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和这种差距的进一步扩

大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祸患，因此极力主张通过学习“夷之长技”、建立船炮水军以抵御外侮。但是，他们的微弱呼声没能唤醒朝野上下，留下的只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直到 20 年后，在英法联军以完全由海军变革的新成果所武装的“坚船利炮”而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因有海无防再次遭到惨败，这才使更多的国人感受到了创巨痛深，一批有识之士接过林则徐、魏源留下的命题，开始做起“海防”这篇大文章来。1865 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并于 1868 年 8 月造出第一艘轮船“恬吉”号。继江南制造总局之后，闽浙总督左宗棠又于 1866 年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其中既有制造轮船的各种工厂，又有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的船政学堂。一个以加强海防为切入点和重心的军事自强运动由此兴起。

1874 年，由于日本侵略台湾事件的发生，引起朝野的极大震动，从而引发了晚清史上著名的海防大筹议。随后，清廷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筹建北南两洋海军的方针：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但在实施过程中，南洋大臣督办东南沿海苏、浙、闽、粤 4 省海防的使命与其两江总督的职权根本无法协调，结果南洋海防的范围最终仅限于江南地区，而闽、粤两省则走上了各自独立发展海军的道路。后经近 10 年的建设，北洋、南洋、闽、粤 4 支海军均已初具规模，但武器装备的质量普遍不高。

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在是年 8 月的马江之战中，福建的 11 艘舰船全军覆没，从此一蹶不振。而且随着战火的蔓延，南洋又有两艘战船被法舰击沉，另有 3 艘被围困港内而无所作为。战后，清廷鉴于筹建海军多年，却仍然毫不足恃，下决心要“大治水师”。经各地督抚详细筹议之后，清廷作出两项决策：一是于 1885 年 10 月 12 日批准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二是决定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从此，中国海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负责督办北洋海防的李鸿章，因其权重位高和朝廷的重视，一开始就很顺利地将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3省作为一个战略地区来统筹规划海防建设。北洋海军的实力建设始终是以外购舰船为主，中法战争之前除自英国购回6艘炮船和“超勇”、“扬威”两艘1350吨的巡洋舰外，又在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7000吨级铁甲舰和2300吨的巡洋舰“济远”号。中法战争结束后，已建成的“定”、“镇”、“济”3舰来华进入北洋服役，而清廷原为加强台湾防务在英、德两国订购的2300吨巡洋舰“致远”、“靖远”和2900吨巡洋舰“来远”、“经远”不久亦拨归北洋。李鸿章对培养海军人才也非常重视，为就地取材起见，他先于1881年创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后于1890年又建成威海水师学堂，而前者的办学质量甚至超过了福州船政学堂。为培养高水平的海军人才，他早在1877年即促成派遣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赴欧洲留学，并在他们学成归国后将学习驾驶的12名学生中的9名网罗到北洋；此后，又分别于1881年和1886年在天津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续派出第二、三批海军留学生。在北洋的影响下，广东亦于1887年在广州黄埔建成水陆师学堂，南洋则于1890年在南京建成江南水师学堂。

1888年10月3日，以清廷批准颁布《北洋海军章程》为标志，北洋海军宣告正式成军，在编军舰有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炮船6艘、鱼雷艇6艘、练船3艘、运船1艘，共25艘36708吨。此外，北洋海军还先后建成旅顺、威海卫两个配套完善的海军基地，以及部门齐全的后勤保障体系，包括1893年建于天津的海军总医院（内分西医学堂、施医院、储药处三部分）。清政府建立北洋海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和遏制日本的侵略，而北洋海军成军时，其实力已超过日本海军，也确实起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在此后的几年里，北洋海军的实力建设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仅新添巡洋舰、鱼雷艇、运输舰各1艘。相反，日本为侵略朝鲜和中国，不遗余

力地扩充海军，其装备质量很快即后来居上。结果，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于 7 月 25 日先败于丰岛，9 月 17 日再败于黄海，最终于 1895 年 2 月在威海卫之战中全军覆没。

北洋舰队的覆没，使中国海军的元气大伤。南洋仅有已陈旧不堪的“开济”、“镜清”、“南琛”、“南瑞”、“保民”、“登瀛洲”、“威靖”、“寰泰”8 艘和 1895 年底刚从德国购回的“辰”、“宿”、“列”、“张”4 艘分别为 90 吨和 62 吨的鱼雷艇，广东和福建所属军舰则大多为用于缉私捕盗的小型舰艇，均无成军之实力。而甲午战败，朝野上下人人痛诋海军误国，甚至认为花费巨资建设海军本身就是个错误，故而失去了重建海军的信心和热情。清廷鉴于北洋海军仅余 1 艘“康济”号练船，不仅裁撤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而且取消了北洋海军的编制。其实，清政府即使有意兴复海军，背负着战败后巨额赔款的沉重压力，也很难再筹措大笔的海军经费；而列强随后又于 1897 年底掀起瓜分中国港湾的狂潮，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半岛等分别为德、俄、英、法各国所强租，中国竟连一个驻泊军舰的基地也找不到了。

尽管如此，北洋作为京师的门户，海防终须恢复。1895 年底，清政府于甲午战争期间在英、德两国订购的 2 艘 720 吨的驱逐舰“飞霆”、“飞鹰”驶回国；1898 年下半年，在德国订购的 3 艘 2950 吨的巡洋舰“海筹”、“海容”、“海琛”建成回国；翌年夏，在英国订购的 4300 吨的巡洋舰“海天”、“海圻”也驶抵大沽。上述 7 艘以及在德国订购的“海龙”、“海青”、“海华”、“海犀”4 艘鱼雷艇全部拨归北洋遣用。1899 年 4 月，清廷起用原北洋海军“靖远”舰管带叶祖珪统领北洋现有各舰艇，任命原“康济”舰管带萨镇冰为帮统。然而，北洋海军的重建刚有一点起色，在不久发生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即有 4 艘鱼雷艇被联军掳走，“飞霆”、“飞鹰”两艘驱逐舰被拆卸。在继之而来的日俄战争中，北洋海军的“海天”号巡洋舰为济辽西“中立”之需赴江阴取运军火时，又在吴淞口附近误触鼎星

岛损毁。重建海军因此受到严重打击。

在北洋外购军舰期间，国内官办的造船企业因经费不足和管理混乱，已处于半停顿状态。福州船政局仅于1903年为南洋造出“建威”、“建安”2艘850吨的驱逐舰，随后即于1907年奉令暂行停业了；江南制造局虽因修造商船而稍显兴旺，但为海军制造的军舰也只有2艘，即1908年建成的305吨炮舰“甘泉”号和1910年建成的500吨炮舰“联鲸”号。因此，南方滨海沿江的地方大员也将购置军舰的重心转向了国外。1903年，两江总督魏光焘向日本订购“江元”、“江亨”、“江利”、“江贞”4艘550吨的浅水炮舰，并分别于1905年和1908年建成交付南洋。190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又先后向日本订购了“湖鹏”、“湖鹗”、“湖鹰”、“湖隼”4艘96吨的鱼雷艇和“楚泰”、“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6艘780吨的浅水炮舰，也于1907至1908年建成交付湖北。这批购自日本的军舰仅适用于长江流域。而湖北为此还于1909年专门建立了一所海军学堂，以培养自己所需的海军人才。

海军教育自然也是重建海军的重要内容。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曾就加强海军教育专门发布一道上谕，后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完全落实。福州船政学堂早在甲午战前即已开始衰落，经过一番整顿后方逐渐恢复生气；江南水师学堂虽于1909年改名为“南洋海军学堂”，但办学质量一直不高；广东黄埔水师学堂也仅限于维持状态。北洋的威海水师学堂已在甲午战争中解散，天津水师学堂于1900年因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而停办，故为培养自己所急需的海军军官，又于1903年创办了烟台海军学堂。同时，清政府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海军留学教育，除继续向欧洲派遣海军留学生外，还开始选派学生赴日本留学海军，且规模比前者更大。

重建海军组织编制的进展同样十分缓慢。1905年初，新任两江总督周馥在与北洋大臣袁世凯会商后，向清廷奏请按“一军两镇之制”由叶祖珪负责统领南北洋海军。清廷批准这一建议后，叶祖

珪即在上海高昌庙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海军办事机关，中国海军的统一才终于迈出了第一步。未几，叶祖珪因病去世，清廷任命萨镇冰为南北洋海军统领。

1906年，清廷将兵部改为陆军部，次年即在该部设立海军处，并明确提出要重兴海军。与此同时，练兵处提调姚锡光奉命起草海军发展规划，按“急就”、“分年”二法编制了《拟就现有兵轮暂编江海经制舰队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五千万两作十年计划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一万二千万两作十二年计划说帖》3个方案。因上述方案、尤其是“分年”方案需费浩繁，未被当局采纳，姚锡光遂又另拟前三年计划，即《拟暂行海军章程》，但最终也未能付诸实施。

直到1909年，清廷才正式决定兴复海军，并于7月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以都王衔贝勒载洵和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8月，清廷将南北洋及湖北省的所有舰艇收归统一，再将适于海防的“海圻”、“海筹”、“海琛”、“海容”、“通济”、“飞鹰”、“保民”、“湖鹏”、“湖隼”、“湖鹗”、“湖鹰”、“辰”、“宿”、“列”、“张”等15艘舰艇编为巡洋舰队，以程璧光任统领；将适于江防的“镜清”、“南琛”、“建安”、“建威”、“江元”、“江亨”、“江利”、“江贞”、“楚有”、“楚泰”、“楚同”、“楚观”、“楚谦”、“楚豫”、“策电”、“甘泉”、“登瀛洲”等17艘舰艇编为长江舰队，以沈寿望任统领。

筹办海军事务处还制定了一个发展海军的七年(1909—1915)规划，但因经费难筹，大多成为具文。即如计划在浙江象山建筑军港，举行辟港典礼后，竟因缺少经费而迟迟不能开工。购置军舰的计划也大打折扣。1909年10月至1910年11月，载洵、萨镇冰前往欧、美、日等国考察海军，先后在意大利订造1艘1000吨级炮舰“鲸波”号，在奥匈帝国订造1艘2000吨级驱逐舰“龙湍”号，在德国订造3艘390吨的驱逐舰“同安”、“建康”、“豫章”号和2艘140吨的炮艇“江鲲”、“江犀”号，在英国订造2艘分别为2600吨和

2460 吨的巡洋舰“肇和”、“应瑞”号，在美国订造 1 艘 3000 吨级巡洋舰“飞鸿”号，在日本订造 2 艘 780 吨的炮舰“永丰”、“永翔”号。在西方海军强国竞相建造 2 万余吨的“无畏”级战列舰之时，清政府所订购的军舰不仅型小式旧，而且装备性能也已落后于时代。这次订购的 12 艘军舰，直到民国后才陆续建成，其中“鲸波”、“龙湍”、“飞鸿”3 舰还因船款纠葛而未交付中国。

1910 年 12 月 4 日，清廷令将筹办海军事务处改为海军部，授载洵为海军大臣，谭学衡为副大臣。次日又命萨镇冰统制巡洋、长江两舰队，统制处设在上海高昌庙。中国海军的近代化建设终于步入正轨，这无疑是中国人对海军近代化认识不断提高的结果。但清廷于此时复兴海军并取得一定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出于强化皇权的考虑。只是清王朝气数已尽，其包括复兴海军在内的一切努力都已回天乏力了。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烈火迅速向全国蔓延。清廷极为恐慌，急命海军开赴长江流域各地，协同清陆军镇压革命。当时，除“海圻”舰由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和管带汤廷光率带已于同年 4 月 24 日前往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后又转往墨西哥、古巴慰问华侨，尚未回国，其余舰艇则几乎已全数出动。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海军在诸多内、外因素的作用下，纷纷转向拥护共和，最终全部投入革命阵营。其中，驻上海的“策电”、“建安”、“南琛”、“登瀛洲”、“湖鹏”、“辰”、“宿”、“列”等舰艇于 11 月 3 日前后反正易帜，沪军都督府特设海军处，以毛仲芳为处长；驻南京的“镜清”、“保民”、“联鲸”、“建威”、“江元”、“江亨”、“楚观”、“楚同”、“楚泰”、“楚谦”、“通济”、“飞霆”、“张”等 13 艘舰艇于 11 月 12 日驶至镇江宣告起义，“飞鹰”舰旋亦赶来加入，并举“楚观”舰管带吴振南为镇军都督府海军处处长，“镜清”舰管带宋文朔为镇军舰队司令；开赴武汉的“海筹”、“海琛”、“海容”、“江贞”、“江利”、“楚豫”、“湖隼”、“湖鹗”、“湖鹰”等舰艇亦自 11 月

12日起先后实现起义，随后分作两队，以“海筹”舰管带黄钟瑛和海军统制萨镇冰的副官汤芗铭分任两队司令；其他分散驻防的舰艇以及广东水师亦相继倒戈。12月初，各处起义海军代表在上海商讨组建海军统一机关及人事安排，公举原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黄钟瑛为副司令，黄裳治为参谋长，毛仲芳为参谋次长，总、副司令未到任之前，暂由参谋长代理一切，司令部设在上海高昌庙。

至此，大清帝国海军的历史宣告结束。而上述反正起义的军舰以及福州、上海、南京、天津、烟台等地的海军机关、学堂、船厂、医院等设施，便都成了满清王朝留给中华民国的海军遗产。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1月

1日 孙中山自上海抵南京，驻宁海军各舰鸣放21响礼炮欢迎。当晚11时，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正式诞生。

△ 孙中山发布《告海陆军将士文》，赞扬海陆军人对革命之贡献，希望他们共励初心，拥树民国，守之勿失。

2日 孙中山犒赏海军1万元。

3日 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法，海军部为中央行政所设9部之一，直属于大总统。同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孙中山所提各部总次长名单，其中海军部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

5日 南京临时政府正式任命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芗铭为海军部次长。

8日 革命军北伐沪军拟由北伐海军护送至秦皇岛登陆，因袁世凯商准英国公使以秦皇岛为中立地，乃改驶山东烟台。

11日 孙中山任命海军次长汤芗铭为北伐海军司令。

12日 孙中山命北伐沪军及由“海容”、“海琛”、“南琛”3舰组成的北伐海军统归关外都督兼北伐第二军总司令蓝天蔚节制。

△ 孙中山偕陆、海军总长巡阅南京狮子山炮台，下午乘“联鲸”号炮舰巡阅海军，亲莅各舰点验。